

吕耀东：对华“两面下注”体现日本矛盾心态



一直以来，日本对华战略就表现为，借重同盟国美国的力量增强与中国讨价还价的能力，谋求通过发展与中国周边国家的关系来抵消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既期望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受益，又担心中国与其争夺地区主导权，认为中国未来有可能在军事上对其构成威胁。因而日本对华战略常常表现出“不确定性”特点。日本这样的对华矛盾心态，导致日本对华政策始终保持两手准备。

首先，在东亚经济区域一体化过程中，日本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为经济大国的强项，积极寻求掌握东亚区域合作的主导权，与中国在经济领域抢夺制高点，力求掌握东亚区域合作主导权。另一方面，日本力图通过“东亚共同体”，引导亚洲区域合作的政治进程，借助所谓“同质性”国家来抗衡中国。日本在不同场合提出要以“自由”、“民主”等价值理念作为东亚区域合作的基础，试图以“价值观”、“制度”等政治“构件”，与中国争夺东亚区域合作的主导权，谋求通过发展与中国周边国家的关系来抵消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其次，力求通过日美同盟遏制中国。2005年的“日美安全磋商委员会（2+2会议）”发表共同声明，确定了12项关于亚

太地区的战略目标，首次将所谓“鼓励和平解决有关台湾海峡的问题”列为日美共同战略目标之一，大有插手台海事务的意图。2009年的“日美安全磋商委员会”会议进一步强调“针对经济和军事实力不断提高的中国，双方在敦促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国际‘利益相关者’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要求其提高军事透明度”。日美以强化同盟关系遏制中国的意图昭然若揭。这不仅无助于维护持久稳定的中日关系，也对东亚地区的安全稳定及区域合作进程产生负面影响。以上战略意图表明，日本对华政策理念尚且缺乏正确的平衡心态和理性的战略思维。

历史事实证明，中日关系不稳定，东亚就不可能稳定发展。近年来，日本国内一些人只看到两国的利益冲突，而无视中日两国合作共赢的成果及前景。包括日本执政党内仍然存在着对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误读，不能正确处理两国“战略互惠”关系，常常急功近利，忽视彼此“共同战略利益”，表现出有损中日关系的言行。譬如日本政府对钓鱼岛的“国有化”方针已经成为破坏中日关系大局的现实症结。

刘江永：“跟班”角色导致日本战略扭曲



二战以来，与美国结盟的日本必然会受到美国对外战略及对华政策的影响。因为日本与世界最强者为伍的结盟政策导致其总是处在同盟中的弱势地位，从而产生了对盟主国家的依附性与从属性。从中美日三边关系的角度观察，日本这种对美依附性与从属性的大小，往往取决于三个因素的相互影响：一是日本在同盟内实力地位强弱程度的变化；二是日本国内政治思潮的变化；三是中国的应对与中日关系和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

纵观1945年至2012年中日关系的发展演变，可以清楚地看到上述的相关性与规律性。例如，冷战时期，日本作为被美军占领的战败国，必然追随美国与台湾当局“建交”；1972年日本决定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与此前尼克松秘密访华有关；1978

年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也得到当时美国政府的默许；1992年天皇夫妇访华，日本率先解除对华制裁，其背景之一是苏联解体后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其经济规模相当于美国的66%、中国的近9倍；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6年，历史认识问题导致中日关系出现“政冷经热”，主要原因是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思潮泛滥；如今，日本伙同美国在军事上防范和牵制中国则与美国战略重心重返亚太，打压中国有关。

在上述背景下，日本针对中国，将钓鱼岛问题与其防卫战略和日美同盟紧密挂钩，狐假虎威，绝非偶然。而这必然与日本在大地震后经济上更加依靠中国的“非对称相互依存关系”发生矛盾，造成日本对华政策的纠结与扭曲。